

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石川祯浩：

把视野放在国际，才能回到历史的现场

本报记者 单颖文 刘力源 翻译整理 戎轶

对于临近的日本、朝鲜或其他国家，中国共产党都没有直接目击其共产党是如何组织运作的，只能通过翻译其他国家发行的刊物、纲领、党章间接接触。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现在的人阅读了更多外国刊物，我们要像当时的他们一样，把视野放在国际，才能回到历史的现场。



石川祯浩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兼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政治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中文著作有《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等，代表性论文有《孙中山致苏联遗书》《小说〈刘志丹〉案的历史背景》等。

石川祯浩教授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两年，自研究生时期便开始研究中共党史，是日本学界研究该领域的代表性人物，被中国学者称为“日本研究中共党史的大熊猫之一”。他考据史料功力深厚，10年著成《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该书出版后在国内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引起较大反响，书中观点多次被该领域学者引用、讨论。

此次，本报特请在日求学的戎轶先生，带着本报记者的问题对石川祯浩教授做一个访谈，以期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第三方”观点分享给读者。（照片由戎轶拍摄）

媒体、出版社、报社、杂志社。早期共产党的主要活动就是宣传，所以媒体出版的存在十分重要。而且，上海与中央政府脚下的北京相比，对社会主义刊物的压制要松一些，这也是上海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点与北京的重大不同在于，上海有租界。在租界中，中国警察不能随便逮捕共产党人，所以租界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共产党人的活动。有了这些因素，上海才成为了共产党的活动中心。反观在北京活动的领袖李大钊，无处可躲，最后躲进了苏联使馆，还被张作霖政府强行搜捕，这在上海是不可想象的。

文汇报：那么，与其他国家相比，您认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特点是什么？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有没有借鉴国际上其他共产党的建党模式？

石川祯浩：就创建特点来说，中国共产党有受到各方认可的明确领袖——陈独秀，导致中国其他名义上的“共产组织”都无法与其影响力抗衡。另外，中国共产组织一开始便是“第三国际”系统的一员，与之前“第二国际”的运动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也没有选择上的困惑。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恐怕无法向其他国家学习。对于临近的日本、朝鲜或其他国家，中国共产党都没有直接目击其共产党是如何组织运作的，只能通过翻译其他国家发行的刊物、纲领、党章间接接触。正因如此，“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对中国共产党建党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大家都没经验，只能听莫斯科派来的顾问的经验。

研究中共党史要有国际视野

文汇报：正如您所提到的，199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70周年，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

主义的思考模式中展开，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述了。

文汇报：您在书中提到，李汉俊曾将当时的中国社会状态描述为“万里荒芜”。您为什么又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天时、地利、人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是建党比较顺利的？

石川祯浩：李汉俊所说的“万里荒芜”并非指社会本身，主要是指文化方面，也就是说，在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时候，出版物很少。另外，李汉俊本人对于有多少人能够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也心存担忧，所以他才会说“万里荒芜”。

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也如我在书中所说，在这样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或者说解读还不充分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得到了很多外在的助力。所谓“天时”，一个就是日本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用日语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当时得以问世。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恰好日本掀起了社会主义热潮，有很多关于社会主义的宣传。

所谓“地利”，则很容易理解。中国与苏俄接壤，从苏俄派来的秘密特使可以更加自由地在中国活动。相比之下，警察组织对于在日本活动的社会主义人士的监视、控制就严厉很多。在日本，尽管有很多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有很多工人，但是从苏俄来的人会遭到严密监视，他们无法接触到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日本，社会主义研究可以顺利进行，但是组织就

难以发展起来。相比在中国，从苏俄来的“密使”在日本根本没有开展革命活动的空间。

所谓“人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中国，陈独秀是一个很有威望的早期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而在其他国家，有很多不同的共产主义领袖，这反而会产生内部混乱，但中国只有一个具有权威性质的新文化运动领袖，所以中国的很多共产主义者都信服他，愿意追随他。所以，陈独秀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第二国际”组织。当时，陈独秀是受到“第三国际”的影响来组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而其他国家则因为和旧有的“第二国际”有过联系，需要做出选择——是回归曾经的“第二国际”，还是加入新的“第三国际”？因此内部产生了不少分歧。而中国因为没有选择上的困扰，所以更顺利地加入了“第三国际”。

文汇报：根据您的研究，中国曾出现过多个以“共产党”命名的组织，请问这些团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石川祯浩：由于统计方法的不同，中国具体产生过多少个“共产党”，各家答案不尽相同。根据我的统计，在文献中有过记载的“共产党”组织有六七个。比如，1920年3月在重庆成立的“共产党”；1920年由全国学联的积极分子发起的“大同党”，“大同党”与共产国际的特使有过联系，他们曾派代表出席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大会；

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张民权组织的“支那共产党”，也曾试图联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还有，江亢虎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不久成立的很小的组织“中国社会主义党”，由于后来江亢虎去了美国，该组织就不复存在了，但其在黑龙江的旧支部则于1921年派出代表试图参加共产国际大会；还有上海的“少年共产党”，就是原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2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如果由欧洲勤工俭学留学学生发起组织的、后来并入国内陈独秀领导的共产党的共产组织也算在内的话，就有7个这样的组织。

这些名义上的“共产党”组织，其实对后来共产党的发展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但需要知道的背景是，当时共产主义在中国十分时髦，尤其受到青年学生欢迎。虽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入，但听到俄国革命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动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运动，很多人都很兴奋，争相模仿俄国，以期改造中国。这样，就有了很多借着“共产主义”名头成立的组织，甚至还有由民国国会议员成立的共产组织。但由于陈独秀的威望高，这些“共产组织”的影响力都很有限。

文汇报：在您看来，上海推行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比其他地方，譬如北京、广州、武汉等地好在哪里？

石川祯浩：简单来说，上海是现代化大都市，交通方便，有很多工厂、工人组织，还有很多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是“天时、地利、人和”

文汇报：为何说马克思主义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一场“知识革命”？

石川祯浩：五四时期，各种西方近代思想洪水般地被介绍进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将其综合体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马克思主义出现于当时混沌达于极点的中国思想界，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吃人的礼教”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妇女解放、科学的世界观、文学革命、东西文明比较、振兴实业等等错综复杂的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通过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以及革命完成后将出现共产主义美满世界的预言，提供了根本的解决方法和对将要到来的时代的信心，从而引起了一场“知识革命”。在这个意思上，马克思主义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在旧有的一切价值被否定、新的替代价值观尚未出现时，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无疑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坐标。例如，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李大钊，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其著作一改从前晦涩难解的观念性思维，变得简明易懂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其文体由文言文变成了白话文，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本身已经开始在马克思

◀ (上接4版)

研究当时就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与之相比,您的研究角度有哪些不同之处?

石川祯浩:我想,主要是我所使用的史料内容和质量与中国国内研究者的有很大不同。比如,日语、中文、俄语、英语的史料我都使用了,我还从世界各地找来了与当时共产党活动有关的资料。其中很多是中国国内研究看不到的史料,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秘密史实。这是我写作这本书的特别之处。

作为一个外国研究人员,我没有太多束缚,中国学者还是会在不知不觉中掺杂政治上的考虑。比如,由于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编者注:毛泽东更多是从政治意义上讲的这句话),很多人就先入为主地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从俄国传来的。所以,当我说中国的很多马克思主义文献来自日本时,就有一些人难以接受。

另外,也有人认为我的观点只强调外界客观因素,是外因说。

文汇报:您在书中提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译自日文版,请问这是如何考证得出的结论?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何又早于日本?

石川祯浩:说到如何考证中国的《共产党宣言》是翻自日文版本,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比较来考证。在数量庞大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中国最早全部翻译的经典是《共产党宣言》。许多人都知道,早在清末就有人介绍过《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1919年出现了两个译本,但都不是全译。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全部译出,中国知识分子因而能够读到全文,是1920年的事。当时,《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只有陈望道一个版本,在日本出版过的版本也很少,其中一个就是幸德秋水、堺利彦都是日本知名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翻译的版本在日本很有名,把他们的版本与陈望道翻译的版本一对比就会发现,二者的体裁和文体的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在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语尚未固定而与日文版标注西文原句的位置一样,比如“自由民freeman”、“奴隶slave”、“贵族patrician”、“平民plebeian”等。另外,中文版还采用了很多原本中国没有的词汇概念,这些都是直接从日语汉字中引入的,比如“剩余价值”等等。从历史渊源来说,清末民初,大量西

方的新文明、思想都是通过日本的翻译进而传到中国的。比如,以梁启超为主的“维新派”当时在日本创办的刊物,登载的都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

日本共产党的成立晚于中国,是因为苏俄派来的特使,是先与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取得联系,后来才与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有接触的。中国共产党比日本共产党成立要早,但这与工人运动的规模、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文汇报:您曾提到,日本相关文献对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非常重要。那么,日本存在哪些与该方面有关的值得发掘的史料?

石川祯浩:在日本的文献资料中,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警察机构的资料。日本曾镇压过共产党的宣传,日本的警察机构很厉害,被监视者的行动言论都会被记录下来,而且资料保留良好。比如,从《外秘乙第995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行动(1921年6月28日)》来看,实际上,警方当时已经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日本警视厅6月末得到的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代表6月末开会,日本人也将参加。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即现在的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黄陂南路,不见得是虚报。此外,日本警察还会监视当时从中国寄来的信件,并作记录。比如,在陈独秀寄给当时在日本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书信中,有具体的建党时间、人物、如何建党等详细资料。这些文献资料都保存在位于东京的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在日本可用来参考的资料,还有中共建党时期,日本警察对时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进行监视所留下的资料,和施存统在警视厅的口供、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证词等。施存统与陈独秀及另一位在日本活动的周佛海都有书信往来,这些信件都被监视。比如,1921年4月下旬,周佛海从鹿儿岛给施存统来了两封信,传达了广州陈独秀来信的意思。从这封信看,由“驻日代表”即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所谓中共“日本小组”,是陈独秀建议在4月下旬成立的,目的是“联络日本同志”。再比如,从《外秘乙第721号需特别注意中国人“施存统”



施存统在东京地方法院留下的部分证词影印件(石川祯浩提供)

之行动(1921年5月25日)》可以看到,施存统在5月8日写给上海邵力子的信,这封信也被警方检查过。信中说“我近来每天都遭到日本警察骚扰,真可恶”的字句。6月17日,警视厅外事科科员找到他,并进行了讯问。后来,施存统在东京被捕,在法庭审查时,有很多他所了解的中国共产主义早期情况的证言记录。

另外,在日本还可以找到很多中国共产党著作的蓝本,我曾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的附录中,做过一个日中文献翻译对照表,一一列出哪些中共文件翻译自哪些日本文献。

文汇报:在您的研究中,是否还参考过其他国家留存的史料?比如,您是否对照过《新青年》转载的《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周刊。

石川祯浩:我参考最多的其他国际史料是俄罗斯的史料。在俄罗斯档案馆中,留有一些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档案,特别是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共档案。中共创建时期的档案,在中国国内几乎没有留下,因为当时中共活动多是秘密进行的。而莫斯科的相关档案尽管数量不多,却完整保留了当时的具体文字记载。虽然我也不是很懂俄语,但通过逐字翻查字典,阅读了这些史料。

通过调查这些西方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很重视阅读、模仿西方著作。比如,中共最早的机关报《共产党》的设计,就参考了英国共产党的报纸;再如,《新青年》封面的设计,也参考了美国社会党的刊物。这样的情况有很多。

文汇报:能否请您谈谈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问题时保持

国际视野的必要性?

石川祯浩: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国际化。对于马克思主义,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比现在的人阅读了更多的外国刊物。当时,他们只能通过外文刊物来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尽管有的人阅读的是日语资料,有的人阅读的是英语资料,但他们都积极地在国外购买马克思主义刊物。所以,我们要像当时的他们一样,把视野放在国际,才能回到历史的现场。

研究党史时要注意区别史料的形成过程

文汇报:您是京都学派的学者,受过严格的考据学训练,您如何看回忆录在研究中共党史中的价值?

石川祯浩:回忆录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是当事人对于自己参与某一事件最直接的描述,具有重要的价值。只是,仅仅以回忆录作为依据,有很多难以确定的信息。比如具体事件的时间、地点可能不清晰。另外,在使用回忆录作为史料时,要看看这个回忆录是在什么样环境、根据什么样的材料、站在什么样的政治立场上写的,需要尽全力去辨识,否则就不能直接使用。特别是有些回忆录并不是光凭作者自己的记忆所写,而是受到其他主流观点、意见、著作的影响。比如,在书中我提到过,出席中共一大的董必武最初认为参加一大的代表总共有13人,但当他受到“12人出席一大”这一主流说法的影响时,也改变过自己的观点。虽然最后经过考证,证实是13人出席。所以,对待回忆录,要结合写作背景、时代背景等回忆录的形成过程,以识别其中的信息是否可靠。

文汇报:您强调研究中共党史要“回到历史现场”,请问书中所说的“考古学”方法对“回到历史现场”有哪些作用?

石川祯浩:这里所说的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并非是我真的套用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共党史,而是一种比喻。比如,我看到了李大钊撰写的文章,同时发现日本有类似的文献,而日本文献出现的时间更早,于是我就推断,李大钊受到过当时日本文献的影响。这就如同考古学家在不同的地方发掘出年代不同但是类似的遗迹,一般都会认为历史较近的那个地区受到过历史较远的那个地区的影响。

“回到历史现场”是史学研究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并非我的独创发明。

文汇报:《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著成15年,再回顾其中的研究成果,您是否有增补或修改建议?

石川祯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文版出版后,确实有很多书评、论文,指出了我著作中的不足。但问题都过于细节,一时难以考据清楚。这本书已经出版了15年,2006年中文版第一版刚面世很快就卖完了,实际上第二版的准备工作早已完成,却因故一拖再拖,延宕至今。最近出版社通知,第二版即将出版。

我自己觉得中文版的这一版其实有比较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第一版出版时遭遇“非典”,拖延3年而后仓促出版,我和译者都未得到机会做校对,里面有些错别字,同时也没有收录序言。虽然内容上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但是形式上还是有不少问题。所以我对第二版做了校对,而且添加了索引。